

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哀愁、抗争到反叛^{*}

周萍萍

内容提要 20 世纪 80、90 年代至今，日本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十分活跃，无论文本内容还是行文方式，都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她们的作品不断入选芥川、直木等纯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将这些女性作家视为开创日本“新小说”的主力军。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能不注目于其生成的历史轨迹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核。本文期望通过对日本女性文学史上的三个高潮期的分析，对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梳理，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加深对整个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把握，以丰富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女性文学 发展历程 哀愁 抗争 反叛

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中，“女性文学”这一术语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逐渐被日本文学评论家采用，此前一般把女性创作的文学称为“闺秀文学”或“女流文学”。关于女性文学的界定，大致有三种说法。^①但一般认为只要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即为女性文学。在现今的日本文坛，女性作家的创作活动十分活跃，水准亦很高，受到众多文学奖项的青睐，被视为开创日本“新小说”的主力军。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使我们不能不注目于其生成的历史轨迹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期望通过分析日本女性文学史上的三次创作高潮，对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历程进行必要的耙梳，以便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加深对日本文学的理解。

一、平安时期的女性文学： 哀愁与批判

平安时代是日本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期。平安初期为汉诗文的全盛时期，但到了九世纪末，假名文学逐渐发展，并走向繁盛。当时出现了一股从复兴和歌文学向女性假名文学发展的潮流。女性作家的创作以藤原道长全盛时期奢华的后宫生活为背景，运用日记、随笔和小说等各种文体，创造了《源氏物语》（1008 年）、《枕草子》（1001 年）等文学作品，把日本的女性文学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涌现出很多在后世仍享有盛名的女性作家，如紫式部、清少纳言、藤原道纲之母（藤原兼家之妻）、和泉式部、赤染卫门和菅原孝标等。这些女性作家多来自中、下层贵

^{*} 本论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0JJD770022）和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女子教育与日本女性文学的伦理空间建构研究”（项目编号：3162013ZY12）的资助。

族家庭。她们具有良好的教养,思想敏锐且对现实生活感受深刻,但由于平安时代的女性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她们为了与不许女性发言的现实相抗争,记录下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尽情抒写心灵深处的咏叹,表现了封建社会日本女性的痛苦和哀怨。

《蜻蛉日记》(974年)是日本日记文学的先驱。作者藤原道纲之母出身于一个低等官吏家庭,却嫁给妻妾成群的显赫贵族藤原兼家为妻。在当时一夫多妻制下,道纲之母的爱情和家庭生活注定是一场悲哀。这种悲哀与忧愁我们可以在《蜻蛉日记》的字里行间探索到其痕迹。《蜻蛉日记》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时光飞逝,半生已过,人世无常,满是寂寥……与地位高贵的男士结发为妻是一场悲苦……”^②作者感叹自己和兼家的不美满的家庭生活,认为自己的前半生是空虚且无望的,其苦恼和哀怨之情流溢于表。而上卷中描写藤原兼家与町者小路之女交往的情节时,直接道出了作者在婚姻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和悲伤心理。她这样写道“九月之时,趁其外出之际,翻开箱子,发现一封写给别人的信件。预感兼家欲与町者小路之女结婚,倍感伤心。”^③

藤原道纲之母在长达21年的持续观察中,把自己的生活与心情记录于《蜻蛉日记》,第一次以女性文学作品的形式面世,可以说在没有女性发言权的社会现实中,以自己所体验到的人生的悲哀为蓝本,开创了一条追求人类内心世界的新型女性文学之路,并触及了“发现自我解放的文学”或是“体验批判精神”的问题。^④

平安时代的女性作家多是从写身边的琐事入手,到抒发个人感受,从写自身的痛苦到反映妇女普遍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的。这其中的杰出代表是紫式部。她的作品《源氏物语》被后人盛赞为日本古代文学的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堪称一流作品。这部作品以真实历史为

背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其中对光源氏爱情生活的描写,映射出一夫多妻制下妇女哀愁与悲惨的命运。

江户时期的文学家本居宣长曾评价道:“《源氏物语》的基本精神是“幽情”,在人的种种感情之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即一切不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刻的。”^⑤据日本学者上村菊子、及川富子和大川芳枝的统计,《源氏物语》一书出现的“哀”多达1044次,“物哀”出现13次。^⑥源氏物语中的“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伤,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叹,融贯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触,幻化为一首凄厉怨恨的哀歌。^⑦如《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的“生魂”缠上夕颜和葵姬,“死魂”附上紫姬和三公主,使她们或暴亡或染病,而夕颜等人都是源氏所一时宠爱的妻妾。这种灵魂附身报复的写法其实是六条妃子恋情哀怨的外化。

紫式部在《紫式部日记》(1010年)中也写道“每当看到和听到一些喜庆的事,有趣的事,反而深深勾起我平素出家遁世的思想,增加我郁闷、忧愁之情。”^⑧但随着作者美学观、人生观的发展,她不再为源氏唱赞歌,不再满足于紫姬的单纯感伤。《紫式部》在结尾部分塑造了空蝉、浮舟这样不甘受辱的女性形象。空蝉的性格外柔内刚,面对源氏的强行侮辱,她公然反抗“你当我是卑贱之人,所以这样作贱我,叫我怎么不恨你。”^⑨浮舟夹在熏君与勾亲王中间不堪屈辱,跳进宇治川自杀,被救起后出家为尼,断然拒绝了熏君要她还俗的请求。空蝉与浮舟这种弱者对强者的抗争比强者间的抗衡更令人震撼,为紫式部的物哀思想平添了亮色。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源氏物语》的作者可能通过一连串的情节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批判,也可能是通过一连串的意淫和

色欲来表现人性之无可救渎，最后达到日本文学传统之一的“物哀”，认为在人的世界经过性的欲望和荣华富贵后，最后还是空虚的悲哀，即佛教中的“寂灭”。^⑩

平安时代之后，镰仓、室町、江户时代的女性文学继承了这一时期的风格，如镰仓时代的阿佛尼、宫内卿、式子内亲王，以及室町时代的西园寺实远之女、日野富子、小野阿通等，都留下不少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的风格趋于平淡典雅，但仍旧蕴含悲惋的情绪。而当时的室町时代和随后的南北朝时代基本为战乱纷争时期，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甚至大不如前，女性的“身心灵”更加明显地隶属于家长，女性文学陷入了贫困境地，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但是，它延续了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的“哀愁”风格，使得女性文学创作处于不间断的虚弱发展轨道上，为明治时期女性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期的到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

二、明治时期的女性文学： 呐喊与抗争

日本女性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期是在明治时期。1868年的明治维新拉开了日本社会全面向近代过渡的序幕。与此同时，西方的“平等”、“人权”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不断涌入日本。在这一思潮的洗礼之下，“男尊女卑”等封建等级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否定，一些知识女性开始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启蒙走向自我的真正解放，她们用手中的笔向社会展露女性的苦闷与忧郁，表现出女性对自由解放的呐喊和抗争。

早期对日本文坛有影响的女性作家是樋口一叶、与谢野晶子、平塚雷鸟等人。在当时，女性作家受到歧视，她们的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向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挑战。

樋口一叶在其短短五年的创作生涯中，竭力写出当时女性社会角色的悲哀、辛酸以及女

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她的代表作《十三夜》（1895年）、《浊流》（1895年）和《除夕》（1894年）等小说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叙述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下女性的悲惨遭遇和生活不幸。樋口一叶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女性，以女性身份约束自己，悲叹自己的命运。其中《浊流》描写了一个小酒馆女招待阿力沦落到花街柳巷，受尽世人嘲笑，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悲惨一生的故事，展现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险恶的世俗浊流中的被动沉浮和苦闷挣扎，表现了封建门第观念等对妇女的摧残。而樋口一叶本身作为女性，尤其是处于文化转型时期（明治初期）的女性作家，她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她既受封建道德的束缚，又对压抑人性的封建道德不满，发出愤怒的呼声。樋口一叶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作品当中，让这些女主人公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向不合理社会发出叹息和呐喊。

与谢野晶子的处女作诗集《乱发》（1901年）被誉为日本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作者以超现实的幻想和浪漫主义的个性笔法，展现了明治时期知识女性向往自由、渴望自我的“叛逆性”，充满了向男权社会抗争的元素。在《短发》中，与谢野晶子喊出了“相爱不问名，道亦不须听，此处惟你我，后果任其行”，^⑪用纯真、热辣的情感表达方式表现了女性对新式恋爱、婚姻以及性爱的追求，震撼了当时的日本文坛。还有“你不接触柔嫩的肌肤，也不接触灼热的血液，只顾讲道，岂不寂寞”^⑫以及“肌肤冰洁、黑发长垂，我那美丽的躯体，惩罚罪恶的男人”^⑬这些大胆的言辞，是处于新旧社会转型期的女性从思想牢笼的禁锢走向人性回归本真的风向标，更是一代日本女性反抗不公现实，摆脱男权束缚的人生探索。

此外，平塚雷鸟以及当时创刊的《青踏》（1911年）杂志也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文学代表。作为日本最早的女性刊物，《青

踏》吹响了妇女追求自由、争取解放的集合号角。在创刊词中,平塚雷鸟写出了“原始,女人是真正的太阳”,^⑭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解放而呐喊。它在同时代苦闷着的年轻女性的心中点燃了希望的篝火,宣告了女性自我掌握命运时代的到来。

进入20世纪20年代,女性文学的另一股势力则来自“左翼女性”团体。代表人物有平林泰子、佐多稻子、宫本百合子、林芙美子和壶井荣等。她们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女性的抗争体验出发,以深刻的笔触表现女性的魅力,为日本文坛带来了许多杰作。其中平林泰子的代表作《在治疗室》(1927年)描写了一个发生在当时日本的殖民地伪“满洲国”的故事:女主人公的丈夫因支持工人罢工而被捕,受其牵连,女主人公因此而入狱,随后患病,加之临产被送到医院治疗,但不幸的是,婴儿因营养不良而夭折。残酷的环境未能动摇女主人公强烈的反抗信念,出院后又回到监狱继续斗争。这部小说表现了女主人公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宫本百合子的代表作《伸子》创作于1927年。小说的主人公伸子在美国求学期间爱上了寒酸的留学生,但遭到了自己父母的反对。为了追求灵肉一致的爱情,伸子对其父母顽固的门户观念、封建婚姻意识进行了强烈的反抗,毅然决定与阿佃结婚。对伸子而言,婚姻是丰富自己并从中获取事业发展的能量。所以,伸子和阿佃结婚后,“她既没有要孩子,也没有要依靠丈夫的所谓发迹,来让别人称呼一声某夫人的欲望。佃有佃的事业,伸子也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在经济上,伸子也没有依靠丈夫。”^⑮显示了女性绝不依附于男性的人格意识。伸子认为爱情和事业同等重要,她对自己的丈夫说道“我也爱事业,和爱你一样!”但是,“如果一定要放弃事业的话……就只好与你分开了。”^⑯充分表现了这一时期新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自我觉醒和无穷力量,这部作品

是“日本新女性投向封建传统的炸弹”。

同类的作品还有佐多稻子的《奶糖厂的女童工》(1928年)、林芙美子的《流浪记》(1930年)和《晚菊》(1948年)、平林泰子的《如此女人》(1946年)、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51年)和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1951年)等。

三、战后日本的女性文学: 反叛与超越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政治趋于民主,社会环境安定,与此同时大量西方现代思潮不断涌入,使日本社会的文化意识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在1946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和平宪法之后,妇女被赋予了参政权,这就从宪法的高度保证日本妇女的权利,和极大地促进了她们的政治觉醒。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迎来了新的繁荣期。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70-1994年的24年中,摘取日本文学第一大赏——芥川奖的女新人有19名,占同期总获奖人数的35%。^⑰

战后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为战败初期至70年代初期。战败初期,日本文坛相继出现第一次战后派、第二次战后派和“第三新人”等流派。第一次战后派和第二次战后派作家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同战前的文学决裂,主张提高和加强“人们的近代精神和自我个性”。女性文坛中兴起的“民主文学”团体当属此类。宫本百合子在1950年率先发表了《歌声哟,唱起来》等多篇反对侵略战争、提倡民主的著作,此后同属于民主主义阵营的佐多稻子、平林泰子、野上弥生子和住井末等相继创作了一大批反对侵略战争,同情劳动人民,热情投入战后新生活的昂扬之作。

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

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形成城市中的青年核心家庭和农村的老年核心家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家庭”的出现使家庭关系从以往的“父子轴心”为主转变为以“夫妻轴心”为主。因此，这一时期活跃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多以家庭为中心，对妻子、母亲的传统角色发出了抗议。代表作家有宇野千代、圆地文子、有吉佐和子和河野多惠子等。

宇野千代的《阿繁》（1957年）、圆地文子的《女坂》（1959年）对传统的“良妻贤母”社会准则提出了异议。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是一些不愿做良妻贤母的女性，她们虽然只是母亲、妻子、媳妇、女儿、恋人，所处地位亦显得十分被动，但正是这些被动的角色频频登场，映射出她们强烈的反叛意识。圆地文子自己也曾说道：“我有一种要高举火把，决不让在过去黑暗家庭中生活的女性同胞们的生命之火熄灭的使命感。”^⑧有吉佐和子的代表作《纪川》（1959年）、《华冈青洲的妻子》（1967年）等小说塑造了日本不同年代的妇女形象，展现了她们反抗传统的奋斗历程和成长轨迹。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达到顶峰，开始进入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而社会功能的强化，逐渐暴露出日本社会婚姻关系中的缺损性和扭曲性的一面。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被不断增强的女性自我意识所识破，她们开始对建立在性别角色分工基础上的婚姻关系进行审视，并做出一系列回避乃至叛逆的反应”。^⑨

日本女性作家们在文本中渗透出的性别意识以最具个性的方式反叛着男权中心的既定传统，构成这一时期日本女性文学的独特景观。她们首先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反“母性”、“娼妇性”等新命题。反“母性”即为彻底否定女性的母性角色，反对和批判女性被看作是生育之本和繁衍之本。“娼妇性”则提倡女性——只求性爱，不要孩子。^⑩对此，著名文学评论家三

枝和子在她的《别了，男人时代》（1984年）中是这样解释的——“女人如果要获得真正的爱的话，那么在与男人交往时就不能要孩子。如果为了生育才去和男人来往的话，必定寻觅不到真正的爱情。”^⑪在她看来，只有这种使女性有绝对的独立性的“娼妇性”，才能使女人不至于沦为男性的奴隶，才能使男女关系发生历史性的位移。其实，这种女性的“娼妇性”与反“母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娼妇性”是反“母性”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表现视角。持有这类观点的女性作家以大庭美奈子、高桥高子和三枝和子等为代表。

大庭美奈子代表作品包括《三只蟹》（1968年）、《食船鱼》（1971年）和《铁杉梦》（1971年）等。这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她们虽然为人妻、为人母，却希望通过破坏“家庭”、“生育”以及“母性”这些强加给女性的既成观念去重新设置自己的人生坐标。^⑫大庭美奈子在《三只蟹》中写到“在20世纪的今天，怀孕不再是结果实的象征，而是不毛与破灭的象征，”^⑬表现出对母性的深恶痛绝和否定母性的强烈态度。同时，她在《雾之旅》（1980年）、《啼鸟》（1986年）等作品中则宣扬新女性的“娼妇性”观点。这两部小说描写了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从属关系的颠倒：在这个舞台上，妻子是主角，丈夫沦为了观众或配角，充当起“家庭主夫”和妻子的秘书的角色，成为了女人的附庸，从而实现了男女关系的历史性和颠覆性位移，这正是女性作家们提出的女性“娼妇性”的最高目标。

与此相反，当代著名女作家津岛佑子却在自己作品中极力肯定和赞美女性的生育性。但是，在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看来，男人们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必然的连带关系已不存在，即女人也不需要男人了。其作品《跑山女》（1980年）和《默市》（1984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独自抚养孩子。

这种写法实为通过否定男性和肯定女性去展示女性的崇高与伟大,进而使女性获得新生。从根本上来看,其与反“母性”的文学观念殊途同归。

进入90年代以来,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新秀,以崭新的文学观念和新颖的文学手法在文坛崛起。女作家们以一种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学境界积极地诉说着作家自己、女性乃至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更贴近生命的真实、更具有叛逆气质和鲜明的超时代的强烈意识。

女作家山田咏美在1985年出版的《上床时间》曾以大胆性爱情节描写引起文学界及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论,震撼了整个日本文坛。之后,松浦理英子的《拇趾P的修炼》(1994年)通过描写女性间的同性爱,将“性”的构造进行分解,打破了两性爱的二元定位,表现出一种多元化、变异化的性。

此外,小川洋子的《妊娠日记》(1991年)、富冈多惠子的《水上庭园》(1991年)、多和田叶子的《狗女婿》(1992年)、村田喜代子的《花野》(1993年)、高树信子的《水脉》(1994年)以及小池真理子的《恋》(1995年)等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女人对既有的“婚姻”与“性”观念的怀疑、动摇和挑战,张扬着女性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旨在建构一个独立的、充满了性别特征又超越性别对峙之上的艺术本真世界。

女性作家的作品不仅在内容方面反映出对传统的反叛和对时代的超越外,在小说语言规范,即在话语表现上也刻意背离惯常的语言叙述模式,以此向男权话语挑战。80年代末,因发表《厨房》引起了社会学的“香蕉现象”的年轻女作家吉本香蕉开创了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女性话语文体,轰动了文坛;另一女作家万智则在小说中引入诗歌文体。进入90年代后,女性作家们通过新的话语文本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意识更趋强烈。这类的代表作家有荻野安奈、多和田叶子和笹野赖子等。

荻野安奈在她的作品《我的母亲喝茶》(1989年)、《有机体》(1990年)、《古事记外传》(1992年)中都夹杂了历史、哲学、电影、绘画和漫画等特色语言,将具有时代感的流行新语与传统方言相融合,完全打破了传统语言规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语言秩序。多和田叶子则在《字母的伤口》(1993年)等作品中结合自己常年旅居德国的生活体验,大胆尝试将一些语言的游戏与怪异的形象塑造相结合,在文体中下决心做自己的“语言游牧民”,致力于“打破流畅的、漂亮的日语”。^①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女性作家们摧毁传统话语体系,重新构建女性话语空间的强烈愿望和大胆尝试,具有“超时代性”。

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从最初的哀怨到质疑、呐喊,甚至反叛的历程,不同的历史时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女性文学,如朵朵奇葩,如雨后彩虹,反映和折射出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进步和发展,使日本女性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观念不断增强,女性作为一个长期被压抑、被框定的弱势群体要求进入中心社会的强烈愿望在女性文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活跃于日本现代文坛的女作家们从不同角度猛烈冲击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大厦,甚至高调宣扬女权主义和个性化理论,通过对两性描写的大胆尝试,和对人生、对人性的真切探索,来建构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我们应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结合日本社会的实际动态去看待和观察今后日本女性文学的走向和发展,并与本国的女性文学的发展做理性的相互参照,对于应该被肯定的部分加以分析和借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 王晶 《战乱时期的日本女性文学》,载《辽宁工程技术

-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306 页。
- ②③ 《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13·蜻蛉日记》, 小学馆 1995 年版, 89, 99 页。
- ④ 王晶 《王朝贵族时代的日本女性文学——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之管窥》, 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4 期, 20 页。
- ⑤⑥ 叶渭渠 《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135, 128 页。
- ⑦ 蔡青 《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 载《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 38 页。
- ⑧ 《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26·紫式部日记》, 小学馆 1994 年版, 151 页。
- ⑨ 《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20·源氏物语 空蝉》, 小学馆 1994 年版, 101 页; 参考《源氏物语》, 丰子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45 页。
- ⑩ 刘达临 《浮世与春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5 年版, 210 页。
- ⑪⑬ 土岐善麿 《日本文学全集 68·现代歌集》, 筑摩书房 1970 年版, 23, 24 页。
- ⑫ 西乡信纲等 《日本文学史中——日本文学的传统和创造》, 佩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263 页。
- ⑭ 佐伯彰一、松本健一监修 《作家的自传 8·平塚雷鸟》, 日本图书中心 1994 年版, 94 页。
- ⑮⑯ 《日本文学全集 18·宫本百合子》, 新潮社 1971 年版, 59, 68 页。
- ⑰ 《现代女性作家研究事典》, 鼎书房 2001 年版, 88 页。
- ⑱ 王晶 《动荡时期的日本女性文学——日本战后女性文学之管窥》, 载《大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62 页。
- ⑲ 田晓红 《战后日本婚姻关系的整合和冲突》, 载《日本研究》2001 年第 1 期, 60 页。
- ⑳ ㉑㉒ 孙树林 《当代日本女性文学中的反“母性”问题及其他》, 载《日本学刊》1994 年第 1 期, 104, 104, 100 页。
- ㉓ 大庭美奈子 《三只蟹》, 讲谈社 1968 年版, 277 页。
- ㉔ 王宗杰 《试论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特征》, 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143 页。

(作者单位: 外交学院外语系)

责任编辑: 林丰民

Japanes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Sadness and Struggle to Rebellion

ZHOU Pingping

Since the 1980s and 1990s, Japanese women writers' creative activities have been very active and also of very high quality. Their works have constantly received literary awards such as Akutagawa and Naoki. Nobel Prize winner Kenzaburo regards these women writers as the main force to create Japan's "new novel". When understanding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we cannot ignore its historical track and its rich cultural contents. By analyzing the three climaxes of Japanese women's literary hist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women's literature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literature.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A Criticism of Leo Strauss's Literary

Reading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XIA Xindong

This essay first presents Leo Strauss' literary reading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from his perspective of esotericism, and criticizes its persecution hypothesis, esoteric writing strategy and esoteric reading strategy, and then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esotericism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Substituting Chinese "Dun" for English Foot: Translating Keats's Poetry and Its
Metrical Forms into Chinese**

LU Wei

John Keats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itish Romantic poets, and his poetry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early as the early 1920s. The 1980s witnessed one of the latest peaks of translating Keats's poetry into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Coincidentally, a heated debate took place in Mainland China in this period concerning how to translate metrical verse into Chinese. A lot of translators who actively translated Keats's poetry were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this debate. Though no consensus was reached, this debate greatly enriched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norms and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Keats's poetry in China.

Civil Wars, Foreign Conquests, and the Redemption of the Roman Nation:

Horace's *Carmina* 1. 2

LI Yongyi

Horace's *Carmina* 1. 2 is not a work of adulation, as suggested by some commentators, eulogizing Octavian for avenging Caesar, but an unflinching denunciation of the Romans addicted to endless civil strife. Ever since its founder Romulus, the Roman nation had been haunted by literal or symbolic fratricide. With omens and prayers, Horace urges the princeps to end the civil war by adopting a policy of clemency, and to redeem the nation through foreign conquests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The ode presents Horace not as a submissive court poet, but as an artist of spiritual independence. His argument for cleansing civil blood with foreign blood, however, reveal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of the Romans: